

# 解读历史之结的力作

## ——荐介《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马大正

正当人类迈向新世纪之际，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项目、国家“211工程”重点课题最终成果的学术力作《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带着浓郁书香问世了。这部著作包括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诸卷，历时八年，砥励而成，粲然可观。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施洛巴赫教授盛誉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笔者先睹为快，十分愿意将这部学术精品荐给大家。

如施洛巴赫教授所说，中国的历史编纂学长期以来没有像欧洲那样将18世纪视为一个独特历史时期的传统。由于学术疏离大众的精英化和学术自身分工的专业化使一些人自然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主编戴逸教授在《导言卷》中指出：“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而诞生。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震撼和改变了世界。世界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进”。与此同时，18世纪对中国也具有特殊意义，有着强汉盛唐的中华帝国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康雍乾盛世。戴逸教授认为，此时“中国社会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太和蒸蒸的华衣下已显现出捉襟见肘的迹象，盈虚消息，础润基张，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西方力量对比位移的质变前夜。因此，18世纪确是考察中西方历史嬗变轨迹、解开许多历史之结的绝佳视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者云，就中国而言，18世纪“经过数千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国情最后基本成形”。毛泽东同志曾把中国国情概括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两点在该书中都得到有力说明：一则是18世纪“清朝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一则是“18世纪的100年间，中国人口不止翻了一番，首次突破3亿，并且一反前代波浪式增长的态势，直线上升。”（《社会卷》第9页）“历史”以英语的语法概念来说，有时往往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完成式”甚至“现在进行式”。从《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

者们的苦心孤诣可看到，焦矢于这一时段的聚集研究不仅是独具慧眼的抉择，更体现了一种鉴古知今的精神与情怀。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对历史之结的解读，同时也是学术发展内在理路演进的结果。18世纪的“东学西传”曾令许多西方思想界巨擘泰斗竞折腰，却同时展现出19世纪“西学东渐”的滥觞。欧风美雨的浸淫使“欧洲文化中心论”在各个学术领域盘根错节，难以消解。费正清以西方为中心的“冲击——回应”模式长期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本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新锐对这种模式展开了批判，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对旧阵营反戈一击，自张一军。“中国中心观”既然强调矫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外力论”，则探本溯源将研究视线移向了18世纪。孔斐力《叫魂》等著作面世实乃其来有故，理所必然。反观中国清史研究的演进可以看出，一方面老一辈学者诸如孟森、郑天挺、谢国桢、商鸿逵等对清入关前后颇为致力；一方面1840年以后的清后期历史即通常所谓的“近代史”在本世纪下半叶长期偏重帝国主义侵略的分析，又与费正清等的西方冲击论实际上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样，清中期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则使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脉络因研究的前、后期隔膜状态而隐约不彰。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毕竟因为语言障碍的遮蔽难免隔靴搔痒，中国学术本土化言之甚易，却行之殊难。《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秉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寻绎“中国文化内部自身发展变化的原动力”（《文化卷》第11页），力图“使人们深刻认识通常所称具有‘中国特色’、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卷》第3页）。可知其作者具有以笃实学风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历史研究模式的学术情怀。

从字面上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可以作两解：一为18世纪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关系，一为从18世纪世界背景看中国。对于后者，戴逸教授在《导言卷》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

地位和状态，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开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对于前者，《对外关系卷》的作者说，与政治、军事诸卷不同，“本卷则是直接论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清前期社会的影响”。“进行18世纪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与其说是方法问题，不如说是研究客体本身的要求。”18世纪世界格局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一方面，世界正成为一个日益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其时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基本完成，南北美洲和东欧提供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在这些全球性活动中执其牛耳，倾全力于工业生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政治革命正不断发展，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其肇始；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美国和法国；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则影响到整个欧洲。从《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诸卷中可以看到，美洲大量低价白银流入中国已成为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影响到普通民众生活并成为清廷决策须考虑的因素。基于此，《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须注意的是，“世界”与“中国”是逻辑上的种属概念关系，研究方法的“应然”状态是以世界而不是以西方为坐标系，西方只是中国的参照系。《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由于考察重点在中国，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将“世界”的概念，化约为“中国的外部世界”，以取消范畴的不对称性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的自我本位情结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只有进行历史比较，辨其异而求其同，察其变而识其常，才能认识历史的多变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从而更深刻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中西比较的特色在《军事

卷》、《农民卷》、《边疆民族卷》等较明彰著。《政治卷》《经济卷》等虽对使用“比较研究”这一解剖刀取审慎态度，却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勾画出以18世纪为背景的中国历史的本真。特别是政治卷从中央与地方人事财政权力的分割变化、权势集团对政治体制、政策运作的影响等方面绵密细致地构造出与现代规范的政治学体系相契合却又非生搬硬套的清代政治史分析框架，堪称独辟蹊径。

9卷本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标新立异”（并非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所谓“标新立异”）的学术著作，在知识再增长和再生产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座如施洛巴赫所说的“里程碑”。《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回答了许多越轶其论域的学术“母题”，对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实现学术本土化等进行了前路先驱的探索，相信会不宣而广。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是集思广益、众志成城结晶的结晶，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学术氛围和学术水准。戴逸教授在《繁露集》中说：“一个历史工作者，脑子里经常考虑一些事情，主要是四件事：一个是材料，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文采，一个是品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正反映了戴教授的治学主张。

历史研究的最大情结在于挑战自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不胜寒的高处以戴逸教授《履霜集》所揭橥的履霜冲寒精神，坚确求道，耕耘不辍，那么中国的学术文化必将“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作者马大正：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100006）